

#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

周文, 司婧雯

(1.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上海 200433; 2. 复旦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为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分别解答中国共产党“如何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和“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两大问题,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经济理论分为4个阶段:(1)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通过土地革命等,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2)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以计划经济理论为依据,大力发展工业化,加快步伐恢复经济、维护国防安全,通过协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发展,保障人民安全,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3)1978~201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全新概念,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等,通过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飞速发展,逐步摆脱短缺经济的状态,使人民收入大幅提高;(4)2012年至今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目标、方式的变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改善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看作统一的整体,致力于在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经济理论以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为基本原则,逐渐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原则,带领全体人民共建全面小康社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理念;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4;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1)04-0001-14

## Explor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ZHOU Wen, SI Jingwen

收稿日期:2021-05-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9MZ01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7DZJ011)

作者简介:周文(1966-),男,重庆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1. 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and summarizes the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a century, and answers the two major ques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w to us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guide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How to develop the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stages: (1) 1921 ~ 1949: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lored the path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democratic economic theory, and enabled the people to ge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tion through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2) 1949 ~ 1978: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econom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vigorously developed industrialization, quickened the pace of economic recovery, and maintained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light industry and heavy industry, the people's safety was guaranteed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as gradually improved; (3) 1978 ~ 2012: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new concept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ed the system of ownership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so on, enabled liber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 up, gradually broke away from the state of the shortage economy, and increased people's income dramatically; (4) 2012 till now: in the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mote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promoted reform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etus, objectives and methods,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regarde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f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unified whole, and is committed to constantly meet people's increasing demand for better lives in development. The century-old economic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reality as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gradually explores the path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leads the people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by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combine theory with reality; people-centere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modern economic system

在百年经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丰富的经济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经济理论,可主要分为4个阶段: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革命道路(1921~1949年);计划经济理论与中国工业化道路(1949~197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1978~2012年);新发展理念与中国经济现代化(2012年至今)。从新民主主

义经济理论到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模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和建设道路,再到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既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也是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因此,梳理百年来党的经济理论探索,既是对第一个百年征程的总结与凝练,又是对

新的百年奋斗方向的指引与前瞻。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经济理论探索始终坚持两条主线: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两条主线解答了“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和“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两大问题。其一,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是基本原则,使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根植于中国发展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sup>[1]</sup>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既避免了陷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条,又跨越了苏联经济改革的误区,使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状况的道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原则,“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sup>[2]</sup>。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平衡了国家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助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中国奇迹”。

由此可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主线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构建之路,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是一条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构建小康社会之路。两条道路相联,实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将逐步实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据此,下文将以时间为序,分别梳理4个阶段党的经济理论及其实践探索,归纳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经济建设经验,为下一个百年征程提供理论支持。

## 一、1921~1949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

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指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革命道路与经济建设路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1年至1949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第一次结合,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相结合,以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带领人民摆脱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展开理论构建。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兼具阶段性和人民性两大特征: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阶段特殊性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所有制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过渡性;第二,土地革命实现了广大农民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翻身”,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体现。

### (一)新民主主义所有制理论:特殊性与过渡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革命,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sup>[3]</sup>。因此,“如何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和“如何看待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此阶段中国经济革命的两大任务。

在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出,现阶段中国的革命在经济上要“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sup>[3]</sup>将经济革命的重心放在了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对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富农经济成分采取了缓和的态度。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对新民主主义所有制结构作出了进一步安排,主要包括:(1)国营经济;(2)私人资本主义经济;(3)农村合作经济;(4)农村个体经济等<sup>[3]</sup>。可见,新民主主义经济不仅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而且还包含资本主义经济要

素。一方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主要包括国营经济和农村合作经济,其中,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根据资本的控制力强弱和影响力大小对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采取不同的态度,严格节制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大资本家的经营活动,如: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将大银行、大工业和大商业收归国有,但由于“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即包括中小资产阶级经济在内的一般资产阶级经济。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政策问题作了进一步补充,充分肯定了在当前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着重批评了“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的民粹主义思想。同时,以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为例,说明了“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要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在当前阶段,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sup>[4]</sup>。

1947年,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更明确的说明:“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sup>[5]</sup>相较于《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有了更明确的定义和分类,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更清晰地解构与剖析。

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现阶段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作用和应持态度。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和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他肯定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现代性工业中的地位,称其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认为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对于资本主义应“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不能“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

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更好地推动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sup>[5]</sup>。同年9月,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国营经济起领导作用,领导各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sup>[6]</sup>。

由此可见,面对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逐步探索出自己的过渡道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思想认识和政策安排更加明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广大人民从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一,始终立足于中国现有的生产力状况,根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在坚持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不但否定了全盘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而且多次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尤其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在现代性工业中的力量,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重要力量。第二,始终立足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过渡性特点,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发展资本主义不仅对经济发展有益,认为以“恰如其分的有伸缩的”的方式发展资本主义既是经济上的必需,也是历史上的必然,盲目全盘消灭资本主义是不够科学严谨的。第三,始终立足于广大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对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资本家、大地主等“特殊的资产阶级”严格节制,带领人民摆脱殖民压迫、摆脱封建压制、摆脱资本剥削,把生产和发展的权力还给人民,带领人民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 (二)土地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中,土地革命理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sup>[5]</sup>。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对于人

民生活和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土地革命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土地革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服务并服从于革命战争这一主要矛盾,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sup>[5]</sup>。

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让广大农民翻身、解放。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sup>[7]</sup>因此,能否改良工农生活事关工农联盟这一基本路线,农民生计、农业生产与革命战争紧密相连,经济建设是革命战争的重要环节。对此,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具体阐述了当前阶段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提出“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明确指出:在当前阶段,经济建设要“为着”“环绕着”“服从于”革命战争<sup>[7]</sup>。可见,新民主主义经济探索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方针和思想,而且也是革命思想的一部分,经济建设不仅为了保障物质供给,而且还“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sup>[7]</sup>

在土地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主要包括:在土地分配政策上,实行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革命路线和方法上,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等等<sup>[8]</sup>。“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所有制改革,改变了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翻身当家作主,满足了农民阶级反贫困、反饥饿、反封建的斗争,极大调动起农民阶层的积极性,从而联合农民阶级加入到

民族统一战线中,扩大并稳固了民族统一战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坚实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劳苦大众解决了有所依,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农民的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与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使广大农民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形成了鱼水相依、骨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工农联盟<sup>[8]</sup>。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土地革命的革命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由于采取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比较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得多的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下,中国共产党还获得了“蒋介石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从而建立起“比任何时期都要广大”“比任何时期都要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组成了民族统一战线<sup>[5]</sup>。

综上所述,面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改革既要解决封建、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又要改变普遍贫穷和饥饿的社会状况,还要兼顾战争时期的物质需求。三方面的现实背景要求改革既要触及封建、半封建制度,又要兼顾战争,还不能忘记人民。土地革命是一条符合中国现实的、独特的革命道路,既与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相符合,又满足了广大人民对改善生活的需要。土地革命通过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土地,从土地所有制角度改变半封建、封建状态,让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在经济上,将土地还给人民,保障贫苦大众生产和生活的平等权力,实现了农民经济上的“翻身”,改善了农民生活,从而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仅推动了农业发展,而且改变了贫困、饥饿的生活状态;在革命斗

争上,土地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扩大并巩固了民族统一战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物质和社会基础。

## 二、1949 ~ 1978 年:计划经济理论与中国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复苏中国经济并稳固新中国政权,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本阶段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主题。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计划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以“一五计划”为标志,中国开启了工业化建设与探索。从国家经济发展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工业是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从社会主义建设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sup>[9]</sup>。因此,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征,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优势,也有片面性、单一性等不足;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道路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进程的缩影,经历了从学习和效仿苏联模式,到反思苏联模式,再到逐步开辟“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过程,积累了“中国化”的经验与教训<sup>[8]</sup>。1949 ~ 1978 年期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以重工业为中心,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毛泽东明确指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工业化就是要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为全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提供发展和改造的必需的装备<sup>[9]</sup>。

“如何复苏中国经济并稳固新中国政权”是本阶段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以重工业开启工业化进程,既是苏联模式的成功经验,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需要。一方面,战后中

国经济复苏需要依托重工业加速工业化进程。从各国工业化道路来看,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轻工业开启工业化的道路,经历了百年的工业革命。相较之下,苏联以重工业为起点,以重工业拉动农业、轻工业等产业部门的机械化和工业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便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模式为中国实现工业赶超、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供了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加强国防、巩固新中国政权的需要。在冷战格局下,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周边战争的安全威胁,加快国防建设是巩固新中国政权、保护人民安全的当务之急。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生产力有限,工业基础薄弱,中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sup>[10]</sup>。因此,需要以重工业为抓手,大力推进国防工业建设,吸取近代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避免再次陷入战争,为国内经济恢复和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 (二) 平衡产业结构,建立起全面、协调的国民经济体系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注意和强调经济均衡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要妥善处理好工业、农业、轻工业等产业部门的关系。1953 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有计划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如果没有这些事业的相应发展,不但人民的生活不能够改善,人民的许多需要不能够满足,就是重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sup>[9]</sup>。可见,产业均衡发展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必要。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与苏联模式的问题,不断调整和反思工业化道路与社会主义建设布局。

在 1956 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论述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他提出:重工业与

农业、轻工业三者相辅相成。其一,提高农业和轻工业比重,可以更好地供给、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为重工业发展提供更稳固的基础;其二,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发展重工业。在中国的社会建设实践中,他首先肯定了中国在处理产业关系上的政策,“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也指出仍需“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再次论述了农、轻、重的发展关系。他指出,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大农业国中国,发展工业应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此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和市场、为重工业积累资金,使工业化更好、更快发展,推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sup>[11]</sup>。

可见,中国的农、轻、重协同发展战略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看作整体,从产业布局内部论述了三产业间的协同关系,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将人民生活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构建了全面、协调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是对苏联模式的超越与创新,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 (三) 加强内陆经济建设,建立起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

长期以来,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仅有30%在内陆,区域间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状态。因此,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同时防备战争威胁,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大力发展内陆地区的工业,构建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讨论了沿海工业和内陆工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分布的议题。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鼓励和支持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巩固和利用好沿海的“工业老底子”来发展和支持内陆工业。同时,依靠轻工业投资周期短、回报率高的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另一

方面,要加大新项目在内陆地区的政策倾斜,“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充分利用好内陆地区的资源,挖掘内陆地区的发展潜力,逐步改善工业分布的不平衡,推动全国范围内工业化整体化发展<sup>[11]</sup>。

1964年,根据各省份工业发展情况和特点,毛泽东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三线建设推动了沿海地区工业向内陆大规模迁移,同时,三线建设工程也大规模启动,修建了成昆铁路等铁路工程、贵州六盘水等大型煤矿企业、刘家峡等大中型水电站、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不仅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而且引进了顶尖的企业、科研院,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完善了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sup>[8]</sup>。

综上所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从学习苏联起步,具有计划经济共同的特点,即依靠指令性命令等方式,国家是工业化唯一规划者和推动力量,工业发展布局和生产规划都以国家计划为依据,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工业化建设。随着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中国在实践中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框架,传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不可否认,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了中国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但也存在不足。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应用超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在所有制方面,过早地消灭了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单一布局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效率;在经济体制方面,将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对立,计划经济体制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灵活性,短期内提高了工业化效率,但是长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二,没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收效有限,短缺经济成为经济的常态。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布局在国防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相较之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发展。因此,“如何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和“如何将推动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是计划经济理论的两大遗留问题。

### 三、1978 ~ 2012 年: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 经济体制改革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正确理论和经验总结,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978 ~ 2012 年间,中国共产党以构建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目标,总结过往的经验和教训,反思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审视现有的国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判断标准、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相容性、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了新的理论认识,逐步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相结合,以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核心议题。

在回顾和反思过去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短期内成效显著,但是长期来看,单一、僵化的经济体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的政策导向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改善人民生活。1981 年 6 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sup>[12]</sup>同时,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sup>[12]</sup>。这意味着:第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创新要坚持社会主

义原则,不能超越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第二,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低级的、未成熟的社会主义,在制度建设和经济实践中,不能超越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循序渐进,走出符合国情、符合经济建设规律、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设道路;第三,现阶段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为迈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积累物质基础。因此,构建适合中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情况、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构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新认识,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扬弃,也是对市场经济的再理解<sup>[13]</sup>。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基本特征,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判断标准。1978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公平与效率关系、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三方面,打破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传统认识,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更科学、更完善的制度体系引导经济健康发展。

第一,改革所有制制度,打破公有制的教条。中国共产党从肯定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入手,逐步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格局,并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制度化。一方面,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提出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关系,肯定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同时,明确提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中国的长期方针<sup>[14]</sup>;在十三大,中国共产党针对各经济成分发展状况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



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强调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sup>[15]</sup>。基于此,党的十四大更加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将非公有制经济提升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以制度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制度的形式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性,标志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进一步明确了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根本原则,为深化改革开放、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二,改革分配制度,打破平均主义的教条。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当时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一方面,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做法,承认并允许分配中因个人工作能力、地区发展能力等产生的收入差距。在1978年12月,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由此产生示范力量,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带动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sup>[8]</sup>。其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突出强调“社会主义不等于平均主义”“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十四届三中全会更具体地阐明了打破平均主义的政策态度,提出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另一方面,承认差异性的同时注意维护公平,平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十三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促进效率提高下体现社会公平;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原则调整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十六大时指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公平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

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sup>[16]</sup>。其后,十七大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马克思按劳分配构想的具体化和科学化,既坚持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又打破了平均主义教条,探索出兼顾公平与效率、先富带动后富的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

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打破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教条,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修正了市场经济的性质。长期以来,主流观点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被作为社会主义的“禁忌”,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认识的不断突破,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判断工具变为资源配置的手段,逐步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指出“应当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肯定了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sup>[17]</sup>;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sup>[14]</sup>;十三大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逐步打破计划和市场的主辅结构,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sup>[15]</sup>。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sup>[18]</sup>1992年,十四大报告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从制度上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统一的整体<sup>[19]</sup>。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打破僵化、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教条,逐步转变对市场的态度,市场经济从被批判、被排

斥开始转变为被借鉴和被学习的对象,肯定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相容性。另一方面,理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二大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辅论”,并划定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边界;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实行的不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但也同时强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逐步调整和完善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sup>[14]</sup>;在十三大,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由国家来调节市场,由市场来引导企业,将市场作为中介嵌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其中,主体是企业,运行的基础是市场,运行的领导是国家<sup>[20]</sup>;1992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四大上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肯定了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规定了国家宏观调控作为其发挥作用的前提<sup>[19]</sup>;党的十五大不再将国家宏观调控作为前提,而是将二者作为并列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此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新时代将市场的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奠定了制度和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本阶段的经济理论及其实践探索与之前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突破了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关系的认知,实现对苏联模式的超越。中国共产党逐渐破除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教条,指明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突破了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关系的认知。一方面,将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解绑”,承认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肯定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解绑”,破除了对“市场”的意识

形态偏见,逐渐突破对苏联模式的盲目崇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概念。同时,理论的进步推动了改革的深化。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党不仅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动荡的国际环境中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探索出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

第二,深化了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知,实现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市场和政府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打破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简单对立,实现了二者关系的新建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肯定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保持二者的良性互动。基于此,中国在资源配置方面,既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弥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固有弊端,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使资源配置更高效、更公平、更合理。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机制体制的重构与再造,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教条认识,同时也保持了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原则和政策,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建构,既超越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又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sup>[21]</sup>。

诚然,相较于第一、第二阶段的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判断标准”“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有了诸多新的认识,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同时,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理论不是彼此割裂、根本对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不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的推翻与重建。相反,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

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待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sup>[22]</sup>。

## 四、2012年至今:新发展理念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解决了社会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也遗留了诸多问题。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带来了新速度、新方式、新结构、新动力——经济增速放缓,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率型转化,经济结构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转化,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化。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致力于构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高形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因此,“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所处的新发展阶段相结合,以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需要解答的中心问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回答了发展动力(创新)、发展方式(协调和开放)、发展性质(绿色)和发展价值(共享)问题,其问题导向就是中国当前发展的结构和质量<sup>[23]</sup>。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剖析国际国内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常态,科学地回答了在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该“建设什么”“如何建设”“为谁建设”3个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一,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创新为发展动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量的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摆脱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状况,从“量的增长”为中心转化到了“质的增长”为中心的新发展阶段;另一方面,长期粗放式发展方式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因此,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要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创新发展是包含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等在内的全面创新,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sup>[23]</sup>。习近平总书记将科技称为“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sup>[24]</sup>。为此,他强调,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sup>[24]</sup>。因此,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要坚持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同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完善创新投入机制和科技金融政策,给予科技发展有利的政策环境,将创新作为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驱动力量。

第二,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协调的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和平衡性。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构建协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理论将现代化与工业化相等同,片面强调工业化的发展,诚然,工业化为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也带来了产业结构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违背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sup>[21]</sup>。因此,工业化不等于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可见,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全面,从单一的、局部的现代化逐步走向统一的、全局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调整改革路径,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主要集中在需求侧,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强化竞争机制等方式,推行市场化改革,强调消费在“三驾马车”的突出作用,而供给侧的改革相对较少。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既有需求因素,也有供给因素,但主要矛盾在供给侧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解决好供给相对不足和供给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将改革重点集中在供给侧,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增强中国经济的质量优势。

第三,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全面的发展布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发展重心集中在国内大循环,构建起以工业化为主体的资本原始积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依靠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等优势,逐渐建立起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现在,中国国内经济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主要矛盾,国际经济中不确定性增强,摩擦增多,因此,面对新时代国内外的新背景,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选择。具体来说,新发展格局的主体是以国内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国内大循环,通过激发内需的潜力来拉动国际循环,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使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统筹起来、联通起来,形成中国经济新的国际经济竞争优势,增强中国经济体系的内外联动性、稳定性和独立自主性。同时,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等方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

第四,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可持续的绿色发

展。环境问题既是发展所导致的问题,又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以解决。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等其他建设方面统筹起来,实现可持续的绿色经济现代化。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sup>[1]</sup>。因此,在发展的同时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发展所带来的问题,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存在以牺牲自然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因此,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可见,绿色发展既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又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途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能源革命,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通过提高生态环保标准,倒逼企业改造升级,淘汰落后企业;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绿色产业吸引和积累资金支持;通过“限塑令”“光盘行动”等政策引导,逐渐改变消费者消费习惯,构建国家、企业、人民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将制度约束与法律约束并行、将约束性政策与鼓励性政策并行、将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并行,加快建设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共建美丽中国。

第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享发展理念。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要义不仅是“小康”,更重要的是“全面”,没有覆盖全民的小康社会,不能被称为“全面小康”。为

此,中国共产党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始终把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同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脱贫攻坚工作实施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标志着中国扶贫方式的重大转变。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了解决,绝对贫困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sup>[25]</sup>。

综上所述,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行动指南。新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方向和着力点,集中回答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动力、方式、路径和目的,集中反映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将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 五、结语

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到计划经济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再到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答了“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和“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将逐步实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一是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足于中国革命需要和社会发展情况,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有伸缩的”发展政策,并带领人民开展了土地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

后,面对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状况和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以计划经济理论为依据,大力发展工业化,加快步伐恢复经济、维护国防安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全新概念,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等,实现对苏联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超越;进入新时代后,在反思中国发展成就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目标、方式的变革,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sup>[26]</sup>。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将土地归还给人民,实现人民对基本生活资料——土地的需要,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工业化和国防建设,保障和平、稳定的建设环境,并通过协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发展逐步改善人民生活;1978年后,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逐步摆脱短缺经济的状态,使人民收入大幅提高,为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到了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告别了千年以来存在的绝对贫困,带领全体人民迈入小康社会,同时,中国共产党把“共享”写入发展理念,将改善人民生活 and 经济发展看作统一的整体,致力于在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7-02(2).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0]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3] 周冰.中国转型期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M].南开学报,2004(2):30-43.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0] 廖季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J].经济研究,1989(3):21-27.
- [21] 周文,程广明.新中国70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J].经济学家,2020(2):33-43.
- [22]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3] 周文,包伟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25]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王佳)